

王干

名编辑文丛
名编辑文丛
名编辑文丛
名编辑文丛
名编辑文丛

云南人民出版社

边缘与暧昧

王 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与暧昧/王干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

(名编辑文丛)

ISBN 7-222-03214-2

I. 边... II. 王...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
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122 号

责任编辑: 宋家宏

装帧设计: 鞠洪深

边缘与暧昧

王 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222-03214-2/I·874

定价: 15.50 元

序“名编辑文丛”

胡廷武

云南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名编辑文丛，顾名思义，这是为名编辑们出的书；由于编辑的种类很多，又特地划定在文学的范畴之内。第一批出版的有王干的《边缘与暧昧》，李敬泽的《冰冷的享乐》，黄宾堂的《距离与空间》，龙冬的《戏剧零

碎》，共是四种，除了龙冬的一种是小说外，其他三种都可以归为散文随笔的范围。我们应当承认，同是著名的文学编辑，他们所写的文字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观点来看，还是从行文的风格来看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找出名编辑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文学潮流的倡导者或者推波助浪的人，我认为在文学编辑的历史性作用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抗战时期的民族抗日战争的大众文学或是国防文学、延安时期的边区文学是潮流；三十年代的小品文运动、二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是潮流；古代的公安派、桐城派是潮流；金庸、梁羽生、古龙是潮流，甚至专写言情小说的张恨水，也由于编辑的推动，掀起过一个小小的潮流。让我看来，前一段从广东发源的所谓“小女人散文”，也曾形成过一时的潮流。我这里不是从文学史的角度顺序来列举潮流，我只是随意举例，说明文学潮流在时空中的普遍存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这些潮流都或多或少推动

了文学的前进和多样化。文学没有潮流，就犹如大海没有波浪一样，就会成为一滩死水，就没有了青春，没有了活力，甚至就没有了承载时代精神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

和大海一样，文学潮流也应该有顺潮流和逆潮流之分，那是针对历史而言的，好的文学潮流应该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文学潮流好像也不是哪一个人有意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它绝对需要有人推动。白话文运动(文学是这个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历史的产物，而胡适等人是这个潮流的推动者，包括徐志摩等人的现代诗，胡适也是一个热心的鼓动者，这是徐志摩自己说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座高峰，当然现代中国诗坛不是仅有“志摩的诗”这一个孤傲的山峰，而是

群峰环列，中心是一个白话化了的“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谢冕也是一个潮流的推动者，他和其他一些文学编辑一起，催生了朦胧诗和其后的现代诗。名编辑文丛第一批的四位作者，也就是这样的文学潮流的推动者，至于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一是要由他们一生的业绩来作最后的判定，二是要由历史本身来作结论。

但是这四位文学编辑参与过一些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形成和发展，这已经是一个事实。正如文学界所熟知的，王干曾经参与为“先锋文学”作第一批嫁衣；李敬泽是“新生代”作家最早的几位保姆中的一人；而黄宾堂和龙冬则是风靡一时的“行走文学”的策划者之一。行走文学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大体应该是指作家在短时间内走过一些地方后，留下来的有关这些地方的文学作品，比如近年出版单位组织一些作家，花一两个月的时间走进或是走过某地之后，留下来一批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写这类东

西想似容易，看似容易，实则非常不容易，随便翻一翻近几年出版的这类出版物，就有理由发出这一感慨了。这些随便走走，随便写写的东西，我看没有一部超过马丽华的《走过西藏》，这部作品中有一些篇章也形成于行走，但它调动了作者在西藏生活十多年的积累、她的文化底蕴和全部的个人才华。

或者游记也是行走文学吧？在中国，最好的游记我以为是《徐霞客游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当然也很好，但那是小说，似乎不应该在行走文学之列。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游记也不错，好在自然随意，但稍逊气概，总体上也显得粗糙；朱自清也写过不少游记，像他的散文一样，看似拙朴，实则精致。郁达夫是把树根直接放在桌子上让读者看，而朱自清则是因势附形，把树根精心加工成花鸟鱼虫，摆在博物架上给人欣赏玩摩。朱氏加

工常常不留痕迹，他的加工本领是十分高明的。我的阅读量十分有限，在国外作家的游记中，我喜欢海涅的。另外二十年前我读过恩格斯的一篇游记《从巴黎到泊尔尼》，是从他的一部著作中节选出来的，我觉得写得漂亮极了，其中一段讲法国盛产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各种葡萄酒给人的不同享受和感觉，那博闻，那准确，那优雅，那精妙，简直可以称为酒的绝唱。而巴黎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世界的中心”，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生发一个事件震撼世界，这样的评价，则是建立在对历史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是权威性也是定论性的。看了这一篇（也仅仅是这一篇）作品之后，我才知道这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才华，不仅在政治和写作政论上，我认为他的文学才能，是不亚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的。

现在，说了以上的这些话之后，对于行走文学，我似乎走进了一个悖论，这就是：说应该提倡吧，这其中已经产生了大量平

庸之作；说不宜提倡吧，这其中的确有优秀的作品。其实不然。我的想法是，关键并不在于走还是不走，在于人；关键也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因此，策划或提倡行走文学并没有什么不妥，倒是有意义有创造性的。现在行走文学有点形成潮流的气候，往后怎么发展，怎么评价，一时恐怕也看不出来，说不出来。

目前市面上的散文，呈一种“触目横斜千万朵”的热闹局面，行走散文则只是其中的一类，此外还有什么大地散文，小女人散文，休闲散文，政论散文，大散文，文化散文，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是评论家们封的，事实未必如此，作家自己也不一定认同，但散文的多样化和较为繁荣的局面则是人所共识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文学的休闲传统，我认为我们的古代作

家几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过休闲生活，中国诗歌中更是普遍展现出休闲的意境。陶渊明不消说了，李白，苏轼，还有大量的山水诗人，都是写休闲的高手。清代的李渔，是致力于休闲散文的大家，他的《闲情偶记》，可以看成是一部休闲学专著，也可以看成休闲散文集。现在小女人散文好像已经式微，但与此有联系的当代休闲散文，却逐渐风靡报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二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精神和思想宽松的条件，人们已经有可能不必遮掩地、坦然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可以津津乐道自己的一把茶壶，一条漂亮的裙子，一次愉快的聊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女人散文是从一个侧面歌颂了这个时代。作家应该在反映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同时，反映人民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其中自然包含休闲生活，因此我们希望名编辑们，在努力推动主旋律的潮流的同时，也适当关注休闲文学这个小小的潮流，这是符合我们文艺方针的多样化的要求的。

这套文丛中的名编辑的说法，不是职称，不是级别，甚至因为没有领导机关的认定也不是一种荣誉；这不是哪一个权威机构的评判，也不是通过某个会议评比的结果，而纯粹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看法。出版社认为，只有在陈述了以上这些之后，这套文丛才有可能操作。这一点希望入选的、未入选的名编辑和广大读者给予理解。最后这几句话是应文丛编辑的要求而写的。

是为序。

2001年7月19日于雨中的香港



边缘与暧昧

目 录

宏观篇

3 90年代文学论纲

28 世纪末的风景——90年代文化心理描述

边缘与暧昧：诗性的剩余与溢涨

56 “新写实”与新时期文学的终结

现实主义无需重构

74 写实的多种可能

82 “新状态”是各种文学关系的总和

小说的新变种

92 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学的四种叙述形态

106 我看96文坛热点

115 话说“小女人散文”

对这一代人的妖魔化指认

126 成长的烦恼

130 仪式的完成

136 保卫90年代的文学批评

141 文学编组法

莫把策划当神话

197 在风中言语 在风中倾诉

205 叙述之外的叙述

214 场景之外的场景

冰洁：透明的流动和凝化

147 文艺批评的 ABC

150 宽容“拒绝宽容”
海上三巫

个案篇

159 历史的碎片与状态之流

168 告别 80 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177 苏童兆言异同论

路上 船上 马上

宏 观 篇

90年代文学论纲

一、90年代文学的背景

90年代是纪年的自然时序，但又不尽然，因为在90年代来临之前，出现了很多终结8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89年北京的六四风波，90年代初的“苏东波”（苏联及东欧的政治风波），都意味着90年代是一个不同寻常、难以言传的时期。20世纪最后

的10年，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之中度过的。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由原来的两极向多极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公开对抗走向了缓和，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水火不相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冰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劳资矛盾在新经济模式下转化为蓝领与白领的差异，而当白领数量大于蓝领人数之后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也已经丧失。和平、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重，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高于主义之争。90年代的巨大事件都表现了在多极格局下的暧昧政治色彩，90年代欧美列强发动的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匆匆收场，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相比，实在更像一场军事演习和一次军事行动。当年不可一世的美军在朝鲜和越南碰到最顽强的阻击，战争的惨烈与漫长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因为那是与西方阵营在交锋，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巨人在打仗。而伊拉

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军攻击伊拉克都算不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至于北约轰炸南联盟倒有点东西(东欧、西欧)之战的意味，但东欧诸国的旁观冷眼使原本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再度交锋的世纪之战变成了北约单方面的屠戮和扫荡。

9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89年之后，喧嚣于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逐渐消解和退场，延续了近50年的党内“路线斗争”被反贪反腐的新政治风暴取代，应该说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在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之后，加强自身干部的纯洁和清洗，以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和战斗力，比那种在路线斗争名目下的权力斗争要具有现实性，更重要的是反腐风暴是非政治性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会给普通百姓带来副作用。影响90年代

中国的一个巨大文本，便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符合邓小平的一贯作风，非高头讲章，谈的都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比很多结构严谨、措辞精确的报告和文件都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就是他从整个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决定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南巡讲话使中国从非资即无的对立思维中挣脱出来，中国社会也由此真正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80年代初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0年代的主要工作还是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清除外围的障碍，还是要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去征服、去消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90年代世界格局的多极发展为中国实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提供了很好的外在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国可以省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由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在中国得到确认，90年

代的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更，这就是在中国社会横亘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惟一性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并与之抗衡，原先的一体化经济转化为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国营与民营，集体与个人，合资与独资，外企与国企，都能够包容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意味着 90 年代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

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与暧昧的世界形式慢慢消解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化上便表现为占绝对主流的话语不在场，多种话语对峙、冲撞乃至消解。传媒成为 90 年代文化的“主频道”，因为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论争都要通过传媒来表达，而 90 年代的传媒已非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很多传媒肩负经济的使命，甚至已经企业化。传媒的商业化使得话语之争渐趋庸俗，话

语经传媒的过滤也开始变味了，文化人、文化名流和文化明星几乎无不成为传媒的“刀下鬼”、“下酒菜”，传媒人在 90 年代便扮演了新一代文化人的角色，他们操纵着媒体实际也操纵着部分话语，他们在不断建立新的神话又在不断瓦解神话，而文学经传媒化之后很快被还原成世俗角色，昔日的文化英雄降格为文化艺人，王朔便是这一降格的符号，因为王朔的名字不是与王蒙、王安忆、王小波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冯小刚、葛优、徐静蕾这些演艺圈的明星作为大众偶像一起出场的。文学在这样的情景下，自然不可能像 80 年代那般站在有人喝彩的舞台上高蹈，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之后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光晕，在获得商业文化的滋润的同时又尝到了商业文化的苦涩甚至铜臭。局部的短暂的文化真空，让作家产生了自由与失控的幻觉，而对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呼唤首先被多元、多样、多极的文化泡沫所掩盖。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和嘲弄人的。

二、90年代文学的特点

90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本人参与策划并鼓吹的就有“新写实”和“新状态”两面“酷旗”，类似的还有“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90年代文学特定条件下，这种特定条件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1. 文学的个体化和个人化与文学的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如果90年代不出现大量的非体制内的年轻作家，没有一批人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入文坛的话，所有的旗帜都可能落空，因为这些个性化的提法往往是非作家协会化的，而另一类

作家往往都被体制化了，他们一般不会越轨操作的。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为多种口号和旗帜的树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新状态”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两面旗帜下“云集”了一批自由撰稿者。

2. 民间策划与政府口号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出现，写作者不必惟政府的马首是瞻，但是他们对政府的号召并不反感。比如“断裂”问答卷里，对“五个一工程”、对“主旋律作品”没有丝毫的不满和亵渎之意，他们抨击的只是他们认为出了故障的文学程序。他们公开表白他们对文学秩序的不满，就像很多人对中国足球充满愤怒一样。

3. 文学载体由原来的刊物的一枝独秀到多头进展，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文学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文学期刊策划出一些“旗帜”来也是为了招徕作家和读者，这实际上是期刊市场意识的觉醒。《钟山》是全国文学刊物

率先打出旗号的，当时打出旗号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是想对全国文学潮流走向作一些分析和梳理，因而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由于适逢 90 年代初期文坛的寂静，“新写实”极为活跃，因而后来触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刊物的这种策划实际是由于刊物自身的危机产生的。

90 年代多元共存、多极发展的文化格局形成，在 80 年代，当文学刊物替代所有刊物时，文学是新闻，也是时尚；是娱乐，也是思想；是故事，也是艺术。这时的文学刊物已处于前媒体时代，90 年代的文学进入媒体时代之后，不得不采用媒体时代的手法，对自己的刊物包装一下、策划一下。给刊物和作家贴标签等于为自己打品牌，在媒体上进行炒作实际接近于广告宣传。这

些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被批作商业行为，甚至视为批评的堕落。而在今天，这些批评轻如鸿毛，掉在地上，批评者自己也不好拾起来了。

有趣的是，很多命名的流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我对“新写实”最初的命名(1988 年)是“后现实主义”(据有关研究者考查，这是最早以“后”命名的概念)，但广为传播的却是“新写实”，1994 年我将一批新生代的作家作品命名为“新状态文学”，但后来流行的却是“新生代”这个概念。更为有趣的，“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而“新写实”理论却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我提出的“情感零度”、“还原生活”、“与读者对话”作为“新写实”三项“基本原则”到现在还受到质疑和反驳。“新状态”和“新生代”的关系是一脉相承，我在“新状态”文学论纲《诗性的复活》中有详细的论述，里面论及的一些问题对今天的“新新人类作家”也有某种预见